

欧 洲 观 察

2009 年第 10 期·总第 53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09 年 10 月 10 日

学术探讨

“欧洲化”与政治社会学

——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理论研究的新视角¹

张骥²

内容摘要：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取得的丰硕的实践成果相比，对该政策机制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直到近年来才出现繁荣的迹象。本文对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的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视角——“欧洲化”和政治社会学进行评介：首先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研究与一般“欧洲化”研究的区别、分析框架、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介绍“欧洲化”视角；其次从欧盟安全与防务场域及其发生学、防务超越民族国家三个方面介绍政治社会学视角；最后讨论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不同于传统一体化研究的趋势。

关键词：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 “欧洲化” 政治社会学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

自 1998 年底圣马洛（Saint-Malo）峰会以来，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欧盟安全与防务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在三个大陆实施了二十多项民事和军事行动，自主军事能力建设和一体化机制机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03 年出台了《欧洲安全战略》并在去年底进行了更新。³但是，与实践发展形成对比的是，有关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理论研究相对匮乏，⁴系统的理论研究更是少见，大部分现有著作和文章都集中于经验研究和政策分析。这一方面是由于该

¹ 本文原刊于《欧洲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23-136 页，现经该刊正式授权予以转载使用。

²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³ 参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和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联名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纪念圣马洛峰会十周年的文章：David Miliband et Bernard Kouchner, “Saint-Malo, dix ans après”, *Le Monde*, 6 décembre 2008；以及欧盟安全研究中心（Institut d'études de sécurité de l'Union européenne）“EU security and defence”年度报告，<http://www.iss.europa.eu/index.php?id=143>。

⁴ Frédéric Mérand, “European Defense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SA Review*, Vol.21, No.3, 2008, p.5. and Bastian Giegerich,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ulture. N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EU's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Baden-Baden: Nomos, 2006, p26.

政策机制相对于其他一体化政策领域而言历史较短，尚处于发展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一体化理论在解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上存在很大困难，⁵或者更准确地说大部分现有理论都对欧盟安全与防务合作持怀疑态度，基本上是在建立在欧洲安全和防务领域尚未一体化的经验事实之上和解释为什么“不存在”安全与防务一体化的原因。⁶

近年来，这一状况出现了转变，有关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理论研究开始出现繁荣的迹象。尤其在欧洲，相关的学术论文不断涌现，⁷近一两年来也开始出现理论研究的专著，⁸还有一些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博士论文，⁹另外还有少数的学术期刊刊发了这一主题的专辑。¹⁰在这些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大部分研究并非采用传统的一体化理论，而是采用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¹¹二是少数采用传统一体化理论的研究当中，出现了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妥协和合流；三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比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逐步兴起和扩展，并且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体化理论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是由于随着欧洲一体化建设深入到安全和防务领域，其“高级政治”的属性恰好成为国际关系理

⁵ Jolyon Howorth,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4.

⁶ Hanna Ojanen, "The Eu and NATO : Two Competing Models for a Common Defence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4, No.1, 2006, p.58.

⁷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Bastien Irondele, "Quelle européan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Les Champs de Mars*, Vol.19, 2008, pp.39-54; Adrian Hyd-Price, "'Normative' Power: A Realist Critiqu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3, No.2, March 2006, pp.217-234; Hanna Ojanen, "The Eu and NATO : Two Competing Models for a Common Defence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4, No.1, 2006, pp.57-76; Barry 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 Response to Unipolarity ?", *Security Studies*, Vol.15, No.2, 2006-04/06, pp.149-186; Frédéric Méran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1, No.2, 2006, pp.131-152; Jolyon Howorth, "Discourse, Ideas, and Epistemic Communities i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7, No.2, 2004, pp.211-234; Ben Tonra, "Constructing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 The Utility of a Cogni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1, No.4, 2003, pp. 731-756; Ian J.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0, No.2, 2002, pp.235-258.

⁸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Martial Foucault,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msterdam: Elsevier, 2009; Frédéric Mérand, *European Defence Policy :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th G. Jones, *The Rise of European Security Coop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z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7; Robert Dover, *Europeanization of British Defence Policy*, London: Ashgate, 2007; Christoph Meyer, *The Quest for A European Strategic Culture. Changing Norms on Security and Defe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6.

⁹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Arita Eriksson, "Europe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Defence Policy. The Exemple of Sweden",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06; Bastian Giegerich, "National Policies Towards ESDP : 1999-2003", London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PhD Dissertation, 2005; Frédéric Mérand, "Soldiers and Diplomat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1989-2003",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 2003.

¹⁰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Special Issue sur "L'Europe de la défense : acteurs, enjeux et processus", *Les Champs de Mars*, Vol.19, janvier 2008 ; Special Issue sur "L'Europe de la défense : Institutionnalisation, européanisation", *Politique européenne*, Vol. 8, 2002; Special issue on "What Kind of Power?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i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3, No.2, 2006.

¹¹ Frédéric Mérand, "European Defense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5.

论和更一般的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对象；¹²二是由于一体化研究本身的发展，从讨论欧盟特殊性（*sui generis*）的阶段进入了“欧洲化”（Europeanization）的阶段，从宏观的研究进入了更加微观的研究；三也体现了欧洲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影响的特色。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现象是否预示着一体化研究的新的发展趋势，值得认真探讨。

在近年来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中，有两个理论视角——“欧洲化”和政治社会学——比较有代表性，也是到目前为止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本文对此展开评述，旨在引起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讨论。

一、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理论研究：“欧洲化”

“欧洲化”（Europeanization）是当前欧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作为一体化理论的第三阶段¹³，它已经成为 1990 年代后半期以来欧洲研究的热点。¹⁴

“欧洲化”的定义本身具有很大的争议，但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是“欧洲化”研究具有两种类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也有学者分别用上传（upload）和下载（download）来比喻。¹⁵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其研究重点放在一体化进程本身以及共同机制和共同政策的创立上，新功能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以及多层治理理论属于这种方法，也就是卡普拉索（James Caporaso）所谓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体化研究。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研究重点是欧盟对民族国家政策和政治的影响，也就是狭义上的“欧洲化”。用学界比较认同的拉德埃利（Claudio M. Radaelli）的定义来说，“欧洲化”指的是一系列过程，通过这些过程，欧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力成为国内话语、身份认同、政治结构和公共政策逻辑的一部分。¹⁶

¹² Sten Rynning, “A Fragmented External Role: The EU, Defence Policy, and New Atlanticism”, in Michèle Knodt and Sebastiaan Princen eds., *Under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Relation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20.

¹³ 卡普拉索（James Caporaso）从一体化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待欧洲化理论，他把一体化理论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 年代以来），以新功能主义为代表，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讨论一体化是如何发生的；第二阶段（1980 年代以来），将欧盟视为一个政体，采用政体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比较政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第三阶段（1990 年代后半期以来），以“欧洲化”理论为核心。参见 James Caporaso, “The Three Worl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Paolo Graziano and Maarten P.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s*,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23 - 34.

¹⁴ 我国学者关于“欧洲化”理论的评介可参考：李明明：“‘欧洲化’概念探析”，《欧洲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8-31 页；吴志成，王霞：“欧洲化：研究背景、界定及其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教学与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48-55 页；吴志成，王霞：“欧洲化及其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38-52 页；以及郑启荣主编：《全球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 章”。

¹⁵ Tanja A. Börzel,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0, No.2, 2002, pp.193 - 214;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y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Europeanization and National Adapt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7, pp.4-8.

¹⁶ Claudio M. Radaelli, “The Domestic Impact of European Union Public Policy: Notes on the Concepts, Methods, and the Challenge of Empirical Research”, *Politique européenne*, Vol.5, No.5, 2001, p.110.
Claudio M. Radaelli, “The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Policy”, in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0.

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运用“欧洲化”的方法来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但在安全和防务政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¹⁷ 巴黎政治学院的巴斯蒂安·伊宏戴乐（Bastien Irondelle）是运用“欧洲化”方法研究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代表人物，他在 2003 年发表的《没有欧盟的欧洲化？法国 1991-1996 年的军事改革》一文中提出了“没有欧盟的欧洲化”（Europeanization without the European Union）¹⁸的概念，在这一领域具有很重要的影响。2008 年，他在法国《战胜广场》（*Les Champs de Mars*）杂志“防务欧洲：行为体、关键和进程”（*L'Europe de la défense : acteurs, enjeux et processus*）专辑中发表了《欧盟安全的欧洲化是什么样的？》文章，系统阐述了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的“欧洲化”方法。笔者试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研究与一般“欧洲化”研究的区别、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欧洲化”的分析框架以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对此文加以分析。

（一）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欧洲化”研究的特殊性

伊宏戴乐指出，与一般的“欧洲化”研究相比，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研究存在着特殊性：第一，一般的“欧洲化”研究通常只强调一体化对成员国的影响，也就是自上而下的路径，其潜在的前提是所研究的政策领域已经实现了一体化。但是，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欧洲化是在一体化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开始和存在的，也就是所谓“没有欧盟的欧洲化”，而且这一政策领域仍然基于严格的政府间主义，欧洲层面的机制化仍然较弱，它采取的是比较特殊的形式。因此，一体化与“欧洲化”的二分法在防务领域并不那么适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欧洲化”研究必须同时注意一体化对成员国的影响和成员国对一体化的影响，同时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和自下而上的路径，而且还应特别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一是分析防务欧洲的形成，通过解释国家在防务这一作为国家主权核心和传统功能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条件和形式来研究欧洲机制的产生以及欧洲调控模式的产生（自下而上的途径）；二是评价欧洲一体化对国家军事系统变革、安全和国防政策调整的影响（自上而下的途径）。这里还应注意区分一体化的两种影响：¹⁹一般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防务领域一体化产生的影响。²⁰

第二，“欧洲化”的理论在分析方法上是以“不吻合”（*décalage / misfit*）概念为中心的，根据波泽尔（Tanja Börzel）和里斯（Thomas Risse）的“不吻合”理论，欧盟政策和规则设计与成员国情况的不吻合产生了适应性压力，成员国必

¹⁷ Bastien Irondelle, “Quelle européan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 *Les Champs de Mars*, Vol.19, 2008, p.39.

¹⁸ Bastien Irondelle, “Europeanization without the European Union ? French Military Reforms 1991-1996”,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10, No.2, 2003, pp.208-226.

¹⁹ *Ibid.*, p.211.

²⁰ Bastien Irondelle, “Quelle européan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 pp.42-43.

须为此作出适应性的调整。²¹然而，在防务领域，并不存在一个欧洲模式或者规范，因此“不吻合”的分析方法不适用。相反，欧洲模式的定义以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机制化成为欧盟各个机构之间以及成员国之间斗争的对象。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对“投射”（projection）和“预期”（anticipation）的考察：在那些想要对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方向施加重要影响的国家（如法、英、德），欧洲化效果非常显著。他们在“预期”的引导下主动进行改革，目的是使自己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影响发展带来的收益分配并从中获利，或者至少是避免被边缘化。成员国通过“投射”他们优先考虑的重点议程和他们的功能模式来引导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向着他们的偏好发展。²²

（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欧洲化”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差别，伊宏戴乐提出，“分析欧洲化就要抓住防务领域共同政策的机制化与成员国军事政策变迁之间的多重互动”，把“欧洲化”理解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它以国家层面的变化和欧洲层面的变化相互作用的方式相联系：“欧洲化”同时是“接受”（réception）的过程和“投射”的过程，从而建立了研究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欧洲化”的分析框架。

“欧洲化”的第一个方面是欧洲防务的机制化和国家偏好向欧洲层面的“投射”。它涉及欧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何解释主权国家参与一项共同政策，而这一政策领域恰恰是国家主权的核心？在欧盟范围内军事问题一体化和机制化的动力是什么？欧洲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合作，是否通过一条独特的途径制定和调整安全政策？他认为，防务欧洲的机制化代表了一种混合（hybride）的形式：尽管已经建立了合作的机制和手段，但其决策程序仍然停留在严格的政府间主义之上。而且，与其他共同体的一体化政策领域相比，安全和防务领域还存在着可替代选项：欧盟与北约的协调，以及双边安全和军事合作。这意味着必须要解释清楚国家为什么以及如何被引向合作，把安全政策的一些领域共同化。这样就需要分析成员国如何通过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将他们的利益和偏好“投射”到欧洲层面。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化”就是国家寻求向欧盟输出（l'exportation）其模式、观念和程序的过程。²³

“欧洲化”的另一个方面，也即“欧洲化”问题争论的核心，是欧洲一体化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在国家军事系统变革中，欧洲化是否是一种强劲的趋势？在防务这一特殊领域，并不存在一个欧洲模式，欧盟也不具备与之相匹配的权能，那么欧洲化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什么？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机

²¹ Tanj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 (EIoP)*, Vol.4, No.15, 2000, <http://www.eiop.or.at/eiop/pdf/2000-015.pdf>.

²² Bastien Irondele, “Quelle européan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 pp.42-44.

²³ *Ibid.*, pp.44-45.

制的诞生对国家防务政策变革的影响是什么？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否为军事系统的欧洲化和趋同带来了一个新的过程，或者是加速了欧洲化和趋同？他指出，安全与防务政策受到两种欧洲化来源的影响：一般政策领域的欧洲化的影响，比如法国 1996 年之前的军事政策的欧洲化是发生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出台之前；以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诞生之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的影响。成员国整合、适应、抵制来自欧洲层面的压力的能力是决定欧洲化路径的关键变量，它根据政策领域和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伊宏戴乐借用科尼尔（Christoph Knill）的概念²⁴，指出在改变和调整国家政策方面，欧洲化能引发四种不同的结果：惰性（l'inertie）、消减（le retranchement）、吸收（l'adsorption）和转变（la transformation）。在这个国家层面的调整过程中，国家机构起着干预作用（médiation），同国际化和比较政治经济的研究结果一样，欧洲化并不意味着趋同。“欧洲化”研究者们的一个共识是，并不存在一个显著的趋同，以出现一个共同的体制模式来同质化欧洲国家的国内结构。²⁵

欧洲化的第三个方面，是一个欧洲场域（un champ européen）²⁶的出现。伊宏戴乐指出上述两个方面提供了“欧洲化”研究的国家路径，第三个路径不仅强调国家行为体的多样性、不同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博弈，而且通过分析激烈的跨政府和跨国的合作-竞争来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欧洲化进程中的作用。跨政府主要指的是在不同国家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合作-竞争，比如在欧洲国家的空军之间，在负责反恐的警察机构之间；跨国指的是私营部门、军工产业、专家网络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欧洲机构的作用以及行政、军事及其他领域的精英推动欧洲社会化的力量。²⁷

综上所述，伊宏戴乐通过对三股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的动力的考察来探讨“欧洲化”的概念：欧洲防务的机制化、国家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一体化以及安全议程的跨国化。

（三）“欧洲化”方法存在的问题

伊宏戴乐还专门讨论了“欧洲化”方法存在的问题。他指出，由于安全和防务政策的特殊性，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是分析官方话语的方法，尤其是关于政策目标和方向、赋予军队的任务以及为改革辩护的话语。这里就存在话语可信性的问题，以及官方话语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差距问题。上述方

²⁴ Christoph Knill, *The Europeanisat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ons: Pattern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ersist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²⁵ Bastien Irondele, “Quelle européan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 pp.45-47.

²⁶ 这一概念即下文中的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field），伊宏戴乐在此处使用了梅朗博士论文（Frédéric Mérand, “Soldiers and Diplomat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1989-2003”）中提出的这个概念。

²⁷ Bastien Irondele, “Quelle européan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 pp.47-48.

法存在一种倾向，将论证的任务缩减到仅仅证明在欧洲层面的发展和国家层面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简单的相关性。这里的问题在于仅在因果链上抽取一个欧洲化的因素，而忽略了造成社会现象的诸因素间的相互依赖。为了尽可能严格地离析和论证欧洲化的效应，应该采取一些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径：如国家间比较的方法，比较几个国家的案例能够区分出导致变化的共同动力与国家的内生动力；过程跟踪法（process-tracing）：基于对决策过程的准确分析找出关联机制；以及反事实推理（raisonnement contrefactuel）：虚构一个场景，假设所要研究的变量不存在或者没有发生来推导结果，以对比评价所要研究变量的作用和分量。²⁸

二、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理论研究：政治社会学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梅朗（Frédéric Mérand）也是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在理论研究方面贡献颇多。他在 2008 年出版的新作《欧洲防务政策：超越民族国家》²⁹一书中将政治社会学理论系统地引入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研究。

书中所指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来源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察，在方法上则深受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³⁰的影响。马克斯·韦伯以来的社会学传统将西欧民族国家视为一个行政机构合法垄断暴力的政治组织，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是一个统治者不断从更小的单元强制积累、集中和中央化资本和暴力的过程。梅朗从民族国家变迁的角度来看待和解释欧盟的建立和发展，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当代欧洲民族国家统治者将对资本和暴力的所有权汇集和委托给一个更大的实体——欧盟的过程，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出现和巩固作为欧洲国家变迁的一个部分，即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受到了挑战。³¹在方法上，梅朗的整个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布迪厄的“场域”（原文法文“champ”，英译为“field”）概念之上并以其为中心的，将欧洲一体化解释为一系列跨国场域（transnational fields）的出现和巩固，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解释为一个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field），并解决这个场域的发生学问题。

（一）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

²⁸ Ibid. pp.48-50.

²⁹ Frédéric Mérand, *European Defence Policy :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³⁰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师，1968年至1988年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社会学部主任，创办《社会科学的研究行为》（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学术期刊并任主编，1982年入法兰西学院任社会学教授。其主要代表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价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影响遍及世界，尤其是欧美知识界。梅朗在另一篇论文中专题讨论了布迪厄的社会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参见 Frédéric Mérand et Vincent Pouliot, “Le monde de Pierre Bourdieu :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social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No.3, 2008, pp.603-625.

³¹ Frédéric Mérand, *European Defence Policy :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p. 1, 4.

梅朗认为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不能在理论上解释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说明它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机制（mechanisms）的理解存在问题，政治社会学的方法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的发展导致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产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欧洲场域的出现导致了欧洲一体化。³²场域是一个结构化了的社会互动的场所，行为体在其中相互竞争以巩固其地位、推行其“视野与分野的原则”（principles of vision and division）。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通过大量国家场域的机制化而完成的。欧洲一体化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系列跨国场域（transnational fields）的出现和巩固，每一个场域都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的行为体、权力结构和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³³

这里从行为体、权力结构与社会表征、欧洲场域与国家场域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概括梅朗提出的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概念。

（1）行为体。梅朗没有将抽象的国家作为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中的行为体，而是将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外交官和军官作为主要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传统意义上“国家主权的运作者”，梅朗称之为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s），而他们又身处民族国家变迁的进程中，因此他们既具有代表和维护民族国家主权的一面，又具有其职业利益和“经验共同体”的一面。来自不同国家的国家行为体在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中持续地互动，其特征表现为：第一，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第二，具有相似的社会表征；第三，相互竞争以影响政策的国内结果和超国家的结果。这体现了场域结构化和等级化的特征。为了巩固其优势地位，其中一些行为体追求建立一系列稳定的规则，其他行为体不想被边缘化只能接受这些规则。当行为体的实践常规化，权力结构被制造出来，社会表征被内化，场域便实现了机制化，成为了一个自我持续的系统（self-sustaining system），其结构将控制其社会行为，并且逃脱其中的个体行为体的控制。梅朗反复强调，这就是为什么在制宪危机的政治背景下，欧洲防务计划还能在 1998 年以来取得重大进步而且始终没有从欧盟的议事日程中消失的原因。³⁴

（2）权力结构和社会表征。梅朗强调权力结构和社会表征是场域的关键特征，我们可以将其观点分为两个向度：从行为体间的向度看，欧盟安全与防务场域是防务政策行为体（来自国际防务场域）和外交政策行为体（来自欧盟外交政策场域）地位竞争的场所。他们之间的互动通常表现出一种分化的形式，即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军官来说是提高军事能力的一个方式，而对于外交官来说是强化政治发言权的方式。他们之间的冲突通常发生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应该是能

³² Ibid., p.136.

³³ Ibid., p.138.

³⁴ Ibid., p.5,13.

力导向还是政策导向的问题上。两个集团都试图让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巩固自身的地位。因此，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成了使他们的社会实践更有意义和增加他们的资源的战略；从国家间的向度看，场域不仅是一个地位的斗争，也是一个观念的冲突。行为体的社会表征深深嵌入国家政治的场域。对于法国而言，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必须走向欧洲防务；对于德国而言，它是为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服务的；对于英国而言，它应该限制在一个政策的水平上。受到国家传统的影响，行为体把他们的社会表征投射到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上：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坚定的干涉主义者，而德国人和其他小成员国则是一体化主义者，强调联邦主义特征。定义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是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能力成了一种象征性权力（symbolic power），将一个行为体的社会表征施加于安全与防务场域，通过动员其他行为体跟随自己的计划来控制初生的欧洲场域。³⁵

（3）欧洲场域与国家场域。梅朗虽然没有把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行为体，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完全超越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他指出，欧洲场域是从现存的国家场域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既能加强国家场域也能削弱国家场域。一些国家行为体将利用他们对欧洲场域的涉入支持他们在国家权力场域中的地位。相反，对那些在国家场域中拥有特权地位但却不能很好利用欧洲场域的行为体，欧洲场域的出现对他们则是有害的。与新功能主义相反，政治社会学并不预言随着社会互动的加深，公民和组织必然将把他们的效忠转移到新的欧洲中心。事实上，他们涉入欧洲场域也会间接或者直接地导致他们拒绝欧洲工程本身。但是，与政府间主义相反，场域的方法确实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泛欧洲社会一体化的发生和产生逃脱成员国控制的政策结果。³⁶

（二）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的起源

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的社会起源（sociogenesis）问题是梅朗研究的重点，他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的构建之所以成为可能，有两个条件：一是欧洲防务结构的国际化，即 50 年来围绕北约进行的军事合作；二是外交决策的欧洲化，即 50 年来围绕欧盟进行的欧洲对外政策合作。这是其核心观点，以下从结构条件、构建主体和路径依赖三个方面来概括。

（1）结构条件。梅朗指出，新的场域通常是从现存社会秩序的缝隙（interstices）中出现的，是当现存秩序发生震动的时候产生的。国际防务场域和欧洲外交场域以两种方式导致了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的形成：第一，北约军事合作和欧盟外交政策合作的实践分别为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提供了军事合作和外交协调的基础设施，而且在防务领域和外交政策领域积累了机制间的联系，形成

³⁵ Ibid., pp.141-142.

³⁶ Ibid., p.139.

了合作文化；第二，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是一个由国际防务场域和欧洲外交政策场域的重叠构成的新场域：其授权、成员身份、结构、实践和社会表征是北约逻辑和欧盟外交政策逻辑的混合物。冷战结束以后，这两个场域受到了挑战，对于国际军事场域而言，北约和美国的关联太过紧密，只有欧盟能够为进一步的军事一体化提供合法性来源。对于欧洲外交政策场域而言，冷战结束后面临的新形势使得单纯的民事手段面临危机，这给新的场域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但是，冷战结束后，当这两个政府间场域出现危机时，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方案³⁷，最终产生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跟一个“经验共同体”密切相关，同时也存在着很强的路径依赖。³⁸

(2) 经验共同体。梅朗认为，在众多的选项中，最终形成的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是由一个相对狭小的由国家行为体构成的集团构思和推动的。在这里，梅朗沿用了“经验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³⁹的概念。在欧洲安全官员这样的经验共同体中，共同的社会表征要胜过狭隘的利益界定、文化的差别和国内的压力。他们之所以能够支持机制化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共识和信仰共识，而且具有强大的专业利益。梅朗同样承认一些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的政治领导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比如索拉纳和布莱尔，但是他特别指出欧洲场域的社会起源需要但不仅仅只是需要政治企业家精神，结构条件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而路径依赖则提供了某种限制。⁴⁰

(3) 路径依赖。关于新的场域是如何从原有的场域和社会背景中生长出来的，梅朗认为政治社会学与历史制度主义⁴¹和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社会变革理论⁴²是一致的。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新的制度是从旧的制度当中分层出来的，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之前的制度形式。社会变革理论则认为新的权力关系是在即存权力网络的毛孔之间的空隙中出现的（interstitial emergence），网络的重叠经常创造出跨网络的它者，一种更加确定的社会互动形式。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出现依赖于从国际防务场域中发展出来的合作文化和从欧洲外交政策场域中发展出来的政治积极性。梅朗则认为新的“权力网络的结

³⁷ 比如在大西洋联盟内提升欧盟发言权的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ESDI）方案，复活西欧联盟（WEU）的方案以及加强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作用的方案等。

³⁸ Frédéric Mérand. *European Defence Policy :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pp.13-16, p.143.

³⁹ Peter Has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1, pp.1-35; Jolyon Howorth, “Discourse, Ideas, and Epistemic Communities i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7, No.2, 2004, pp.211-234; Mai’a. K. D. Cross, *The European Diplomatic Corps: Diplomat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Westphalia to Maastricht*, Houndmills: Palgrave, 2006.

⁴⁰ Frédéric Mérand. *European Defence Policy :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pp.13-16, pp.143-144.

⁴¹ Paul Pierson, “The Path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A 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9, No.2, 1996, pp.123-163.

⁴²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构化”是基于无数的大大普及和机制化程度很高的欧洲跨国场域。像欧洲安全与防务这样的场域很容易从现存场域的缝隙中生长出来。⁴³当然，政治社会学同时强调新的跨国场域形成的偶然性和创造性，以及路径依赖制约性的一面。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出现也是一个试错（trial-and-error）的过程，是从特定群体的行动中偶然产生的，这些行为体筛选和利用了冷战后出现的各种选项。同时，欧盟外交政策机制的刚性决策程序则制约着安全和防务一体化的程度。外交和防务政策行为体的社会表征的分歧经常打断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27个成员国中不同的政治和军事文化制约着政治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进程。⁴⁴

（三）国家变迁：防务超越民族国家

对一般的一体化理论而言，经过上述分析，关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一体化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政治社会学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它继续探讨这一进程的社会根源。梅朗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欧洲民族国家变迁的一个表征，而不是其原因，在这一进程中，过去四个多世纪作为定义民族国家的核心功能的防务已经不再为国家所垄断，“防务政策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⁴⁵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国家的去军事化和军事的去国家化。国家的去军事化体现为，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国防是民族国家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的财政开支；而今天国家的主要特征是社会功能，国家权力的强制维度已经让位于更加精致的立法、监督和对社会要求的回应。军事变成了一种服务，可以被提供、分享和重构，而不再是国家的关键属性。民族国家已经丧失了对军事效忠的垄断，以及通过军事机构建立起来的排他性的认同。欧洲各国公民对欧洲防务的支持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欧盟本身的支持。⁴⁶军事的去国家化体现为欧洲军事力量更像是在一个多国的框架下（可以由联合国、北约、欧盟或者专门的联盟来提供），而不是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运作。欧盟外交、安全和防务合作的进程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成员国的安全政策和军事系统变革的决策。国家在实施军购计划和部署军事行动时不考虑欧盟机制和其他国家政府已经变得不太可能，而且通常把欧盟层面的原因作为其政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就说明军队的角色已经不再那么紧密地和国家主权的行使连接在一起。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个效忠会超过另一个，但是它为军事一体化创造了广阔的空间。⁴⁷

三、结语

从上面的评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伊宏戴乐的“欧洲化”方法还是梅朗的政

⁴³ Frédéric Mérand, *European Defence Policy :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pp.15-16,144-145.

⁴⁴ *Ibid.*, pp.15-16,145-147.

⁴⁵ *Ibid.*, p.3,16,137. .

⁴⁶ *Ibid.*, p.153-154.

⁴⁷ *Ibid.*, pp.147-154.

治社会学方法，都呈现出与以往的一体化研究不同的景观。

第一，“超越”欧盟。伊宏戴乐的“没有欧盟的欧洲化”概念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即欧盟不是一体化的唯一机制。“欧洲化”理论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开始于欧洲层面的政策和机制形成之前，政治社会学则认为其是欧洲民族国家变迁的结果，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二者都认为欧洲安全与防务一体化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欧洲化和一体化的区别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但这里至少提示我们，一体化的现象有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政治社会机制，而以往的一体化理论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另一方面，这种超越究竟是由于安全和防务政策的特殊性造成的，还是在一般意义上也成立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伊宏戴乐和梅朗都使用了欧洲场域的概念（尽管所指不同），并且是后者理论的重点，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论解释仍然是不足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释，那就是这个场域的变化以及是否可逆，如果该概念不能得到证伪，那么把它作为一体化的机制同样可能存在简单的历史关联的嫌疑。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与那些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洲场域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它们的出现存在先后顺序，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欧洲防务合作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场域之间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别？

第二，理论的综合。伊宏戴乐提出必须同时分析一体化对成员国的影响和成员国对一体化的影响，而且重点在于二者之间的互动。这就把传统一体化理论研究的方法和狭义“欧洲化”研究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并且和比较政治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也打破了政府间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间的藩篱。伊宏戴乐的分析框架仍然主要建立在把国家作为单一的行为体，以及分析国家的偏好、行为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这一方法总体上还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之内。而梅朗的研究方法则超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将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来对待，解构了国家的本质性以及国家认同、国家偏好这些概念。⁴⁸但是，梅朗的理论和方法却与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紧密的联系，从总体上能够看到建构主义对整个理论框架的影响。梅朗的核心观点之一（战后欧洲防务结构的国际化和外交决策的欧洲化是欧洲安全与防务场域出现的结构条件）则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不同的是，这些结构条件在新现实主义看来是外生性的，而梅朗则将其归结于民族国家变迁所导致的，是内生性的。我们很难用传统的方法将他的观点归结为某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这正说明各种流派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发生了综合。正如导言中提到的，基础理论方法的介入和理论的综合是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出现

⁴⁸ Ibid., pp.154-157.

的一个趋势,这一趋势的发展及其对一体化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仍然没有从理论上得到很好的解释,这就是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北约的关系。尽管已有大量实践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文献,但正如本文介绍的两种理论方法一样,如何从理论上对欧洲安全结构中存在的这两种模式的关系及其未来做出解释仍有一个巨大的问号。这同时反映出当前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缺陷,就是集中于从欧洲内部的因素来讨论,而没有对外部的因素给与应有的重视。

简讯

* 9月24日至25日,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及中国欧盟研究会合作举办“中欧对话:求同存异”圆桌会议。

* 9月28日至30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上海《俄罗斯研究》杂志社举行以“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青年骨干研究人员高级研修班,同时举行第三届欧亚论坛:“形成中的中亚权力均衡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The emer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O)。

* 9月29日,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胡贝特·海内特教授、博士(Prof. Dr. Hubert Heinelt)访问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举办“德国政党格局的发展与2009年联邦议院选举结果分析”学术研讨会。

* 经学会推荐,胡键撰写的《中国软实力建设:必要性、瓶颈和路径》一文在上海市社联“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评选中荣获优秀论文奖。

欧洲动态 (2009年9月11日—2009年10月10日)

中欧关系

➤ 9月13日德国之声,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中国问题研讨会上发生中国官方代表团中途退场事件。当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作家戴晴上台发言时,中国官方代表团中的大部分成员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前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表示,来这里参加会议不是来聆听一些人的民主说教。除戴晴之外,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贝岭也出席了本次讨论会。

➤ 9月22日星岛环球网，赴美出席系列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1日晚在纽约下榻的饭店会见法国总统萨科齐，就双边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看法。胡锦涛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中法关系。保持和发展良好的中法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萨科奇表示，很高兴看到法中关系快速向前发展，双边关系进展顺利。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法国非常重要，法方愿同中方携手合作，建设双方关系的美好未来。

➤ 9月23日德新社，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决定延长欧中经理交换培训项目(METP)。该项目第5期将于明年5月启动，报名阶段从今年9月21日起至明年1月7日止。METP项目由欧委会和中国政府共同倡议问世，为期4年，2006年开始实施，每届10个月，所有费用由欧盟承担，结业者获得欧盟驻华大使颁发的证书。迄今，已共有约400名来自欧盟和中国的经理从这一训练项目获益。

➤ 9月24日凤凰网，英国首相布朗通过凤凰网向中国人民祝贺国庆。布朗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已经恢复了它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上的角色意味着，中国继续的繁荣、稳定和成功，对于英国也至关重要。中英两国间的关系，通过建立并加强密切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已经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好阶段。中英在经济、气候变化、贸易等方面开展了十分良好的合作。

➤ 9月24日华尔街日报，在中国食品卫生官员与欧盟卫生专员于北京举行会晤后，中国周三坚持对从多个欧洲国家进口的猪肉设置新规定。上周，中国宣布对从丹麦、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个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进口的猪肉实施新规定，要求这些国家提供其生猪未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证明。此前，中国已对从北爱尔兰进口的猪肉实施了这一规定。由于新规定给出口商带来了额外成本，欧盟对此表示反对，并称欧盟的猪肉产品是安全的。

➤ 9月29日国际财经时报援引路透社消息称，外交及行业消息人士透露，欧委会料将在10月22日会上提议，把对中国鞋类产品的反倾销关税延长两年。

➤ 9月29日星岛环球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28日晚在巴黎举行国庆招待会，法国政要纷至沓来，祝贺新中国六十华诞。中法官员同时宣称：经双方共同努力，中法关系已“雨过天晴”，掀开了新的一页。

➤ 9月29日德国之声，德国联邦议院大选降下帷幕，联盟党和自民党组成所谓黑黄联盟共同执政的梦想将得以实现。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次德国大选引起外交大换血，对中德之间外交关系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影响。首先一个影响就是德国黑黄联合的政府当中将不会有亲华者，就是说未来的德国政府就是非常以自己利益为主导的，没有任何中国情结的政治家的联合政府。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它有的是务实者。这个政府当中，主要的政治诉求和政策的走向，并不是外交政策，而是内政，怎么让

德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在这个摆脱危机，寻找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必然的会成为德国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伙伴。因为双方有惊人的相同的利益共同之处，两个国家都是出口大国，这个出口大国现在是英美主要的攻击目标。这次在匹兹堡的会议上也明显的看到，英美希望中国德国日本，这些外贸盈利国家要做出更大的政治牺牲。所以中德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出口大国，从英美的角度讲是贸易的盈利大国，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必然要宰它们这两个肥羊的话，中德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大的变革当中形成一个比较强硬的利益共同体。

➤ 10月6日新华网，苏格兰中国国际发展商会日前在英国北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成立。

➤ 10月7日美联社，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周三表示，德国总统克勒和政府总理默克尔将于下周一在柏林会晤来访的中国副主席习近平，双边关系、以及气候保护和经济政策等国际问题将是会晤时的中心议题。

➤ 10月7日新华网，中法商务企业合作协会成立仪式7日在中国驻法使馆商务处举行，此举标志着中法中小企业有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中法商务企业合作协会于今年8月在法国注册，会长由当地知名企业家陈世明担任，荣誉会长是德勃雷和法国巴黎雇主协会主席迪福。

➤ 10月7日新华网，为期两天的第四届中德大学校长会议7日在德国南部蒂宾根大学闭幕，与会者就推进中德高校实质性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教育交流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中德两国大学之间的交流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现已有300多所中国高校与100多所德国高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目前在德中国留学生总数约为3.7万人，是德国大学中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之一。

➤ 10月8日新华网，中西论坛西班牙委员会新主席索尔韦斯就职招待会8日在西班牙外交部举行。索尔韦斯是中西论坛西班牙委员会第二任主席，曾担任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经济财政大臣。中西论坛是中国和西班牙两国政府首脑议定的项目，其宗旨为促进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目前已成为中西双边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该论坛每年举行一次，自2003年成立以来，已先后在北京、巴塞罗那、上海、马德里与成都召开5次。

➤ 10月8日新华网，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7日晚在英国保守党年会期间举办以“中英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的中国论坛。保守党副主席斯普林、保守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利汀顿、英国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莱昂斯等政界、学术界和经济界人士作为嘉宾出席。保守党副主席斯普林表示，保守党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致力于发展持久和强有力的对华关系。保守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利汀顿表示，目前约有10万中国学生在英国留学，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扩大双方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

政治外交

➤ 9月11日德国之声，欧盟委员会准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巨额资助，推动有关签订新的国际气候保护公约的谈判。一份由欧盟环境问题专员迪马斯提交的方案中，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措施，逐步提高资助资金的内容。有关的援助款项将在2020年提高到150亿欧元。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适应全球的气候变化，世界贫困国家到2020年之前，每年总计需要1000亿美元。

➤ 9月12日德国之声，联合国安理会5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德国正在寻求尽快与伊朗就其核计划展开谈判。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就此在德黑兰同伊朗政府进行了接触。

➤ 9月12日德国之声，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将不再阻止国际社会与邻国克罗地亚进行入盟谈判。迄今，双方之间的边界争端妨碍了克罗地亚的入盟努力。

➤ 9月13日美国之音，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7年来首次接见了一个欧盟高级代表团。欧盟一位官员在哈拉雷表示，欧盟与津巴布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将维持对穆加贝总统及其幕僚的制裁。瑞典发展部官员卡尔松星期天对记者说，制裁不是“永久的”。但是欧盟官员说，在恢复双方关系正常化之前，津巴布韦必须停止践踏人权和允许媒体自由。他们还呼吁全面落实穆加贝总统与茨万吉拉伊总理间的权力分享协议。

➤ 9月14日德国之声，首次访问朝鲜的德国福音教会代表团团长、福音教全国委员会主席胡贝尔周一在平壤呼吁朝鲜半岛实现统一。德国福音教会代表团此行是应朝鲜天主教协会的邀请。拥有2300万人口的朝鲜国内仅有数千名基督徒。该代表团本周二起将对韩国进行为期6天访问。4800万韩国人中共约有基督徒1350万。

➤ 9月15日德国之声，德国下萨克森州计划从明年起对穆斯林神职人员在大学进行职业培训，从而开创了该领域的先河。该州内政部长许内曼称，迄今为止，阿訇多半来自土耳其，他们在德国只居留工作三年，因此，融合德国社会的程度很低。穆斯林神职人员用德语培训，有助于减少旨在蛊惑仇恨的经文演说。据悉，奥斯纳不吕克大学将从2010年的冬季学期开始设立这一课程。

➤ 9月15日德国之声，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的欧盟成员国外长发表一份声明指出，近期以来，苏丹南部地区局势明显恶化，此外，对骚乱地区达尔富尔，迄今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也缺乏严肃的政治谈判。

➤ 9月16日德国之声，欧盟议会周三以多数票表决同意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连任。巴罗佐的蝉联申请得到保守的欧洲人民党、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议会党团以及自民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社民党议会党团在选举中投弃权票。在今年7月召开的欧盟峰会上，27个成员国一致提名巴罗佐连任。在过去5年的任期间，巴罗佐注重对全体成员国一视同仁，并力克阻碍，致力于使拥有5亿人

口的欧盟在气候保护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采取共同立场，为此获得好评。

➤ 9月19日星岛环球网引述法新社报道，普京当天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举行的一个投资论坛上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最终决定取消在欧洲东部修建导弹防御设施的计划，这让我们有了良好的期待。”奥巴马17日宣布放弃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

➤ 9月20日星岛环球网，基地组织18日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视频录像，称如果在本月27日德国议会大选中获胜的党派仍不主张从阿富汗撤军的话，基地组织将对德国进行“粗暴的警示”，还提出了基地组织的“和平协议”：“如果德国能够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士兵，那么基地组织也将从德国撤出所有成员，基地组织将说到做到。”

➤ 环球时报引述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当地时间21日晚证实说，在布朗访美参加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和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会同他进行“双边”会晤。有官员称，英国首相不能同主办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尽管布朗最近还反复强调英美两国间拥有“特殊”的关系。星岛环球网指出，这是因不满英国政府释放洛克比空难制造者迈格拉希的决定，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在本周举行国际会议期间同布朗进行单独会晤。

➤ 中新网引述英国每日电讯报21日报道，布朗希望通过与卡扎菲的纽约会晤，向外界强调：卡扎菲2003年做出放弃开发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决定，使利比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接近。英国与利比亚的关系，自从苏格兰法院8月以人道主义为由，决定释放身患绝症的1988年洛克比空难主谋迈格拉希以来，就备受世人关注。洛克比空难造成270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迈格拉希的获释引发了英美两国关系紧张。布朗否认曾对苏格兰施压释放迈格拉希，也否认释放决定的背后有石油交易。

➤ 9月23日德国之声，联邦德国总统克勒周三签署了关于实施里斯本条约的配套法律，从而为德国最终批准这一欧盟改革条约铺平了道路。据总统府一名发言人宣布，克勒总统将于本周五正式在国际法意义上呈交批准证书。对德国而言，从这一天起，里斯本条约在法律的意义上最终得到了批准。

➤ 英国首相府23日证实，首相布朗本月24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时，将会宣布英国准备大幅裁减核力量，希望藉此推动其它国家作出努力，裁减核军力。布朗强调，今次决定大幅裁减核军力，与经济因素无关，而是要配合奥巴马的核政策和方针，并迫使其它国家例如伊朗，停止研发核武器。

➤ 9月24日泰晤士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3日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在谈及伊朗核问题时，俄罗斯首度表态，愿意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制裁伊朗。梅德韦杰夫特别强调，某些时候制裁确实是必要的。俄美两国首脑会

晤结束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外长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了“3+3”会议。

➤ 9月27日德国之声，被关押在颇有争议的关塔纳摩美军监狱的两名恐怖嫌疑人被遣送到爱尔兰。美国司法部还表示，另有一名也门籍公民被遣返回国。美国一家联邦法院于今年5月作出裁决，释放这一也门公民。受爱尔兰政府的请求，美国并没有透露两名送往爱尔兰获释囚犯的身份。目前共有223名囚犯仍然被关押在关塔纳摩监狱内，其中包括约十名中国籍的维吾尔人。

➤ 9月28日德国之声，德国联邦议院大选结束。获得明显多数票的联盟党和自民党将联合组成黑黄新政府。本届大联合政府中的联合执政党社民党遭遇历史性惨败将变为在野党。虽然联盟党以近34%的得票率交出60年来大选历史上最差成绩，但是自民党赢得近15%的选票保证了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仍然可以连任。黑黄联盟在联邦议院中占据331个议席，高于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结成所谓“红红绿”联盟的291席。社民党得票率仅为23%，为1949年以来最低。此次大选的投票率为72%，也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的最低纪录。

➤ 9月29日德国之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大选当晚亲自拿起话筒，祝贺默克尔获得选举胜利。华盛顿的观察家相信，在良好的祝愿之后，美国很快将对新的德国政府提出要求。在德国大选之后，美国将再次向德国询问是否能够在阿富汗予以美国更多的支持。在关塔纳摩美军监狱的问题上，美国也会发出更多的询问。迄今为止，德国政府拒绝接受那里的囚犯。美国观察家总体上认为，在黑黄联合政府任内，德美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密。美国媒体称自民党重视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是美国的好朋友。

➤ 10月5日新华网，欧洲联盟成员国爱尔兰公投《里斯本条约》所获结果3日揭晓。爱尔兰公投委员会宣布，投票选民中67.1%赞成批准这一旨在简化欧盟决策过程、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保障的条约。

➤ 10月6日德国之声，法国扩展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在能源和航天领域的合作。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萨巴耶夫周二在阿斯塔纳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根据相关协议，法国将帮助哈萨克斯坦成为尼日尔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铀矿供应国。两国外交部同时签署了关于哈萨克斯坦允许法国经由哈萨克斯坦向阿富汗运送部队和物资的协议。另据报道，法国希望在欧盟改革后由法国人出任欧盟外长一职。据“巴黎人报”周二报道，现任法国外长科什内表示，愿意成为候选人，前欧盟委员巴尼耶也有意担任这一职务。“巴黎人报”称，科什内已不愿意继续在独断专行的萨科齐总统的羽翼下工作，而更愿意在欧盟的外交舞台上活动。

➤ 10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的助理说，卡钦斯基将在周日签署核准欧盟“里斯本条约”。

➤ 10月10日金融时报，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捷克共和国总统克劳斯昨日要求豁免《里斯本条约》中的权利与自由章节（类似于英国和波兰），从而在批准该条约前又设置了一个障碍。

经济产业

➤ 9月15日德国之声，欧洲出现了微弱的经济复苏迹象。在一份经济发展预测报告中，欧盟委员会认为本季度欧洲的经济增长将平均达到0.2%。但就全年而言，欧元区以及全欧盟区内的经济总量将出现4%的下滑。该报告认为，欧盟各国的经济景气计划以及对金融领域的治理必须继续下去，这是因为目前的增长还十分缓慢。根据这份估测报告，德国已经战胜了经济衰退。今年后半年，欧盟最大的国民经济德国将继续维持增长的势头，虽然增长的幅度并不大。

➤ 9月16日德国之声，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英国首相布朗表示，将要求20国集团匹茨堡峰会就国际金融市场和经理红利的监管作出“具体决定”。布朗强调说，20国集团匹茨堡峰会必须发出这样的信息，即，每一个国家未来都必须遵守规则，否则，金融系统将重新回到原点，而这一状况不能让人接受。

➤ 9月20日星岛环球网，伊朗总统内贾德日前宣布，伊朗将使用欧元取代美元成为外汇储备货币。

➤ 9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德国官员昨日警告，20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各国将会“分歧扩大”。美国的提案招致了欧洲的批评，认为其过于关注全球失衡，而非金融监管改革。美国提交的草案宣称，拥有可观经常账户盈余的G20成员国，将“承诺实施促进内需拉动型增长的政策”。德国向来抵制任何会限制其经济政策操作空间的协议，该国表示，它只会同意G20成员国评估其政策影响的非约束性监控机制。

➤ 9月23日德国之声，受到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德国出口下降达到了战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幅度。据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长年占据出口世界冠军位置的德国，09年上半年出口额为3900亿欧元，同比下降23.5%。但最近数月，已出现出口复苏的初步迹象。6月和7月的出口额与上个月相比分别有所提高。

➤ 9月24日德国之声，西门子集团同前高管层之间就前董事长冯必乐涉及的贿赂丑闻形成的争执日趋激烈。西门子公司限定公司前高管在今年11月中旬以前交纳600万欧元，否则就将向法院提交要求获得数十亿元赔偿的诉讼。冯必乐以及另外7名前董事被指责在西门子贿赂案中未能尽监管职责。西门子公司涉及的海外贿赂案总共高达13亿欧元。

➤ 9月26日华尔街日报，巴罗佐在G20匹兹堡峰会闭幕时发表声明称，对G20的决定表示欢迎，并称尤其对G20新确定的永久性角色感到特别高兴。巴罗

佐表示，他相信 G20 建立了国际新规则的基础，这将通过开放市场和抵制保护主义的诱惑使世界实现繁荣。

➤ 9月29日星岛环球网，欧洲中央银行总裁特里谢28日表示，欧洲央行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为货币市场提供强力支持，而是会适时退出现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 9月29日新华网，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29日说，由于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2010年实施退出策略依然过早。

➤ 10月7日德国之声，欧盟委员会认定，因德国财政赤字超标而对该国启动惩罚司法程序的条件已经满足。欧委会周三正式宣布，德国本年度新增债务已经明显超过了欧元区货币稳定与发展公约所规定的3%的上限。欧委会称，德国的这一赤字超标并非暂时现象，明年，德国赤字率还将上升，从而难以满足赤字上限规定。相关的情况也出现在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奥地利、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等国。欧盟货币委员阿尔穆尼亚称，他认为，启动对德国等国家的赤字超标惩罚司法程序已不可避免。

➤ 10月7日新华网，欧盟委员会7日建议欧盟在未来10年内增加500亿欧元发展低碳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挑战，保持欧盟的经济竞争力。欧盟委员会负责科研事务的委员波托奇尼克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欧盟制定的能源技术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对发展低碳技术的科研资金将有助于欧盟开辟经济增长新途径、发展绿色经济和保持企业竞争力。

➤ 10月8日德国之声，经过两年谈判，欧盟和韩国就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欧盟委员会宣布，10月15日将在布鲁塞尔临时性签署该协定。这个协定是欧盟历史上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协议签署后，欧洲的出口商每年将节省12亿欧元关税。由于担心韩国竞争对手获得有利条件，谈判过程中欧洲汽车制造商曾多次对谈判人员施加压力。韩国是欧盟在亚洲最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之一。韩国消费者每年购买的欧洲货物达到25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希望，该协议能够于2010年生效。

➤ 10月9日金融时报，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一份排行榜，英国取代美国成为金融发展第一国。